

# 诗人阿垅：时代风暴中的“白色花”

马晓萱，钱文亮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摘要：**在“七月派”的成员中，兼备多种写作能力的阿垅在诗歌与理论批评方面的才华尤为突出，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宗教感和对自我生命的赤诚，既给他的诗歌带来预言般的崇高美，也使他在大时代的冲突与变革中遭致宿命般的人生悲剧。鉴于此，文章以诗人阿垅的创作经历与理论批评遭遇为中心，在文学、社会学、思想史等开阔的人文科学视野中，深入考察与反思了阿垅及其“七月派”同人独特而普遍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阿垅；白色花；胡风事件；七月派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2)05-0104-13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2.05.010

**Poet Ah Long: "White Flower" in the Storm of the Times**

Ma Xiaoxuan, Qian Wenli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July School", Ah Long, who had a variety of writing skills, was particularly talented in poetry and theoretical criticism. His rich life experience, religious sense and sincerity to his own life not only brought the prophetic sublime beauty to his poetry, but also caused him a fatalistic life tragedy in the conflict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eat era. In view of this, the poet Ah Long's creation experience and the theoretical criticism he encountered are placed at the centre of an in-depth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n the unique and universal tragic fate of Ah Long and his colleagues of "July School" within the broad horizons of the humanities, such as literature, sociolog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Key words:** Ah Long; white flower; Hu Feng Incident; July School

但是一寸的强进终于是一寸的前进啊

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

以一寸的力

人底力和群底力

直迫近了一寸

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

——阿垅《纤夫》

在流派纷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七月派”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可一不可再”的文学群体<sup>[1]</sup>。这不仅是因为其人数众多，骨干成员多达近四十人且分布于全国不同地区和行业，远超一般的文学社团规模而最终

**收稿日期：**2022-05-2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7JJD750002)

**作者简介：**马晓萱(1996—)，女，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胡风研究、新诗研究；

钱文亮(1965—)，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胡风研究、新诗研究。

被称为“胡风集团”;也不仅是因为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甚长,从抗日战争时期一直活跃到解放战争时期,直至解放以后,且在全国各地形成互相呼应的“分支”,大有方兴未艾之势;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一文学群体自始至终都以著名左翼文艺理论家、诗人胡风为核心,在人生态度与文艺思想上深受鲁迅以及被视为“鲁迅大弟子”的胡风的影响,并通过鲁迅、胡风继承了五四一代所追求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强的精神凝聚力。除此之外,“七月派”的骨干成员又以才华横溢的左翼青年作家和诗人为主体的,在走入文坛之初大多受到胡风的直接指导和提携而成为文坛闪亮的新星。因此,对亦师亦友胡风的文艺思想,他们更容易接受或产生共鸣,成员之间也能够产生一种休戚与共的认同感。然而,这成为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具有统一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面一个“和而不同”的异端存在,正如我党文艺干部何其芳在1952年12月11日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指出的:

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分不清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革命文艺界,本来是相当普遍的现象。胡风同志的错误的严重性在于他在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并不用它来检查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仍然积极地宣传他那些错误观点,用它们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这样,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实际上就成为一个革命文艺界内部的反对派了<sup>[2]</sup>。

作为小资产阶级文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功实现思想改造的典范,何其芳在1944年、1945年曾先后两次受中共中央委派与刘白羽等延安文艺干部前往重庆,向国统区左翼文化界宣传并组织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然而,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显然并不具有共产党员高度自觉的组织观

念,对何其芳等人在重庆的工作不仅没有积极配合,甚至在此前后还多次发表与《讲话》精神不同的文艺观点和文章,根本没有意识到:“从本质上说,作为整风成果的《讲话》并不是提供学术讨论的,它毋宁是作为党在特定时期的意识形态要求强制向各地推行的。”<sup>[3]</sup>结合前述何其芳的文章,不难推断,1955年发生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以下简称“胡风事件”)已经在此时埋下了伏笔。此后,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成为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对国统区文人进行改造、规训的重点对象。当然,这种改造、规训的目的就是希望胡风和他的“七月派”同人们能够放弃自己在文艺实践中的个性化成分,深刻领会并接受《讲话》中的思想与观点。这也正是后来担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林默涵所说的针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四次“批评”的根源与动因。而由于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对何其芳等人在重庆时期工作的抵触,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便在全国解放前夕的1948年专门创办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sup>①</sup>有计划地组织了对包括胡风文艺理论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集中“批判”,希望借此在文艺界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以迎接新时代。

然而,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发动的意识形态“询唤”还未取得批判者所期待的效果,历史就很快翻开了新的篇章——新中国成立。为此,属于左翼文艺阵营的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同样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他们很难想象,在具有统一的思想观念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人眼中,不接受中国共产党发动的意识形态“询唤”,仍然在文艺思想上“还搞自己一套”的他们<sup>[4]</sup>,已经被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且只是作为“统战对象”的存在。但是,在1955年他们却又被新中国定性为一个敌对性质的“反革命集团”,几乎所有的骨干成员最后均未逃脱覆巢之灾。<sup>②</sup>

作为建国后文艺界最早、最大的政治案件——“胡风事件”,人们数十年来从多种角度

进行考察、分析、阐释和叙述,其中将之归因于胡风与当时执掌中宣部副部长之权的周扬之间的私人恩怨也是一种常见的解读。这种研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也陷入了如当年对待胡风一样的认知误区。正如1952年7月23日周扬写给周恩来的信中所言:“翰笙同志把胡风写给您和主席的信,给我看了。信中提到我在上海和他的谈话。我感觉他似乎故意将我的话曲解(也许是因为他的神经质的敏感的缘故),把理论上的原则争论庸俗地理解为无原则的人事问题。”<sup>[5]</sup>周扬这封信的意思已经非常直白,对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的“询唤”并非周扬对胡风的个人行为,而是中国共产党针对这个文学群体每一个成员的集体组织行动。只有把握了这个基本点,我们才能客观、全面地理解为何是“小人物”的阿垅成为了建国以后“七月派”文学群体中第一个遭到集中批评与打击的人。

## 二

在为数不多的关于“胡风事件”的著作中,诗人阿垅写于1944年的《无题》诗中的那一句“要开作一枝白色花——因为我要这样宣告,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sup>[6]</sup>,往往被视为一语成谶,无意间隐喻了“七月派”同人为诗与真理而遭遇的历史命运。大概也是因为这一点,当绿原、牛汉在“文革”结束后编选“七月派”二十位同人的代表性诗歌合集时,就直接以“白色花”作为书名,表达了这些劫后余生者对于“七月派”群体悲剧命运的共同认知。

阿垅之所以能够一语成谶,其实并非偶然。虽然说,“七月派”人才荟萃,但在人生阅历的丰富、感受力的敏锐、理性思辨的兴趣等方面,除了胡风,阿垅仍然罕有其匹。对此,学者万同林曾经高度评价说:“由于诗人受到浓重的西方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显示人性深度以及诗的美感表达上,都鲜明地凸现在一般诗人之首。从诗本身的意义来看,他的才华有时超越了胡风、艾青及其他同仁。……由于阿垅别具一格的宗

教感给他的诗作注入了另一种精神气息,致使他的许多诗篇宿命般‘预设’或隐喻了自己一生的命运。”<sup>[7]</sup>万同林的评论并非溢美之词。除了前述的佐证,其实早在1941年,阿垅便在自己撰写的首篇诗论《箭头指向:〔诗歌〕》中解释了诗谶的真实性,认为诗之所以可以是预言,“第一,诗人有十分诚挚的心;而第二,历史有必然的法则。”<sup>[8]</sup>据此而观,阿垅之所以能够在一首形似爱情诗的《无题》中发出“无罪”却又“凋谢”的谶语,就不仅仅是因为他受西方宗教文化影响而对生命所具有的终极关怀和“罪感意识”,更因为他对自我生命的赤诚,以及常常进行宗教哲学层面的自省与反思,因而在结合丰富生命感知的智性直观中可以洞见“大时代”的某种必然法则。

从长期的文明史视野来看,阿垅和“七月派”同人所经历并参与的中国的20世纪,的确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古老文明如凤凰涅槃般在现代性的烈火中弃旧图新、砥砺复兴的伟大时代。也正是因为置身于这样一个“大时代”,面对捉摸不透的强大历史意志,与无数的同时代人一样,阿垅和“七月派”同人当然也无法完全避免多舛而最终“凋谢”的命运。尽管在人生的开始凭谁都不会、也不愿想象自己会成为悲剧的主角,甚至是阿垅本人,至死都不愿相信自己最后成为了一个历史冤案的发端与牺牲品。阿垅在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反动军官”而瘐死狱中之前,1965年他在最后一份书面陈述材料中,这样写道:

首先,从根本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全然是人为的、虚构的、捏造的!

……

从1938年以来,我追求党,热爱党,内心洁净而单纯,做梦也想不到会发生如此不祥的“案件”。当然,我也从大处着眼,看光明处。但这件“案件”始终黑影似的存在。我还期待着,能

够像1942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整风的结果那样,能够像毛主席亲自解决问题那样,最终见到真理,见到事实。只有那样,个人吃了苦也不是毫无代价。

整个“案件”,就是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基本矛盾。

我的心情,如同行星,围绕着这个矛盾中心而旋转<sup>[9]</sup>。

阿垅的这一份材料在2001年公布于众后,曾经震撼了无数人。这份材料不仅令人再次感受到阿垅作为诗人的赤诚与圣洁,也有力证明了他能够独立思考、敢于直言谏诤的过人胆识,证明“诗人与战士是一个神的两个化身”(胡风语)并非虚言。而阿垅正是以这样的人格,完成了自己在“大时代”中的历史角色和使命。所以,在“胡风事件”中,阿垅虽然被胡风作为控诉周扬等人把“小人物”拒之马克思主义门外、剥夺其反批评权利的代表,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却是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勇者”,也是“七月派”同人中罕见的能够超越偶然表象进行理性思考的“大智者”。

### 三

从“胡风事件”在建国后的发酵和发展来看,发生于1950年的阿垅“引文公案”可说是贯穿始终的主要线索之一。换句话说,接续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未竟的意识形态“询唤”之业,建国后,周扬所主导的对于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的“思想斗争”,正是以1950年阿垅的“引文公案”为开端;到1954年11月,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重提“引文公案”,最终遭致周扬代表毛泽东对胡风的发言进行全面批驳,进而发展到1955年“胡风事件”的爆发<sup>[10]</sup>。

事情不得不从阿垅解放前复杂曲折的经历说起。

阿垅原名陈守梅,别名陈君龙,除“阿垅”

外,另有笔名S.M、亦门、圣门、师穆、张怀瑞等,是一个自少年起就热爱文学的城市平民子弟。阿垅早年曾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经济系,因1932年“一·二八”事变的刺激而投笔从戎,于1933年考入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通称黄埔军校)第十期步兵科,然后到南京受训。1936年,军校结业后的阿垅到国民党第八十八师担任见习军官及少尉排长。在南京期间,阿垅受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的儿时好友陈道生的影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产生了强烈憧憬。1937年8月,阿垅和部队奔赴上海闸北抗日前线,在淞沪会战中战斗近三个月,直至受重伤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在伤愈后停留湖南衡阳期间,阿垅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战斗经历创作报告文学《从攻击到防御》《闸北打了起来》等,这些诗文以“S.M”的笔名于1938年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半月刊上发表。阿垅也由此与胡风结缘。

1938年11月,经由胡风的引荐,通过当时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胡风好友吴奚如<sup>③</sup>的帮助,阿垅奔赴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sup>④</sup>几个月后,阿垅在一次野战演习中眼睛受伤,被中共党组织送往西安医治。自1939年底起,阿垅在西安国民党“战干团”四团任少校教官,后去重庆国民党军令部一厅任少校参谋。1944年春至1946年夏,阿垅考入国民党陆军大学受训至毕业;1946年秋至1947年夏,在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任中校战术教官。1947年,因搜集军事情报给中共地下党组织被所在军校发觉并通缉,阿垅逃亡南京,化名陈君龙进入国民党中央气象局任资料室代理主任。1948年夏,阿垅到国民党陆军大学研究院第十二期任中校研究员,后任国民党陆军参谋学校中校、上校战术教官。

从“皖南事变”开始,无论是在四川还是南京,阿垅经常利用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任职的便利,将听到和看到的国民党军事动态、消息,报告给与中共党组织及其领导人周恩来等联系密

切的胡风。“1947年后,阿垅不单以信件向胡风透露国民党消息,而且还通过胡风、杭行、方然以及我党在南京的情报人员郑瑛,直接向我党密送情报。”<sup>[11]</sup>也正因如此,周恩来在“胡风事件”爆发后,才会告诉有关人员说:“阿垅是我方的地下情报人员,给我方送军事情报的。中宣部和统战部要注意这个问题。”<sup>[12]</sup>

不难看出,按照政治身份而论,阿垅实际上是为中共革命事业的胜利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地下情报人员,那么,为何还会成为“胡风事件”中的受害者呢?原因只能从阿垅的文学经历和诗学理论及其与胡风的关系中寻找。

如前所述,早在1938年阿垅就与胡风相识,此后,又陆续结识了“七月派”的作家、诗人,如艾青、路翎、贾植芳等;1939年,阿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反映南京失守和大屠杀的纪实性小说《南京》,并在1940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征文中获得一等奖;同年,经胡风編集并命题的阿垅的小说集《闸北七十三天》也被列入《七月文丛》,由上海海燕书店在香港出版;1942年,阿垅编成的诗集《无弦琴》被胡风列入《七月诗丛》,以“亦门”的笔名由希望社在桂林出版;等等。由此可见,阿垅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展现其“多才多艺”的特点,但加入“七月派”之初的阿垅在文坛却基本处于“潜伏”状态。这主要是阿垅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中任职的缘故,曾经在延安学习的经历更使其不得不谨言慎行。

#### 四

1943年3月,因“皖南事变”避难香港的胡风回到重庆。1944年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论文《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认为“从武汉撤退后开始的转换期,在两三年前已经走进了一个混乱期”,而要扭转这个混乱局面和“病态倾向”,就必须“发动明确的斗争形式的文艺批评”,“只有通过批评才有可能揭开而且解剖一切病态倾向的真相,保卫而且

培养一切健康力量的生机”<sup>[13]</sup>。以这篇论文为最初的“动员令”,并通过路翎等人联系北碚的青年学子,胡风独立发动和组织了被后来的研究者称为针对整个文坛的“整肃”运动<sup>[14]</sup>。而在这次引起不小论争的批评与被批评风潮中,仅在胡风与路翎的通信中被点名批评的就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朱光潜、马凡陀等不少颇有影响力的作家。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22日,胡风又撰写了《关于结算过去》的短文,强调应“总结这八年民族战争期间的文艺成绩”<sup>[15]</sup>,对其重新进行筛选与甄别,从中整理出正确的现实主义文艺发展方向。1946年2月返回上海后,继续打理《希望》的胡风重新将“整肃”时期的文章陆续刊登在该杂志上,如石怀池的《评〈一个人的烦恼〉——目前创作自然(客观)主义倾向的一个例子的剖析》、冰菱(路翎)的《谈“色情文学”》(评碧野《肥沃的土地》)和书评《“淘金记”》(评沙汀)、未民(路翎)的《市侩主义底路线》(评姚雪垠)等。

作为胡风非常信任和亲近的“七月派”同人,1944年开始涉猎文学评论、内向严肃的阿垅卷入这场批评与被批评的文坛论争几乎是在所难免的。但在一定程度上,阿垅相对边缘的状态直到1947年《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一文的发表才有较大的变化。虽然他在1945年首次以“阿垅”之名在胡风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聚焦诗歌问题的文学评论《箭头指向:[诗歌]》(该文被安排于胡风卷首文《置身在民主的斗争里面》之后,可见胡风对该文的重视),但因为同一期上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所引起的反响过大,成为毛泽东亲派自己的秘书胡乔木出面解决的重大“公案”,因此,阿垅的文论当时并未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阿垅因为身份、工作和生活上的变故与变动始终未能直接参与这场批评与反批评的笔战:阿垅1946年3月丧妻,同年夏季毕业于重庆国民党陆军大学,并到中国国民党

陆军军官学校成都分校任战术教官,照料小儿子 and 岳母一家;此后,阿垅陆续获得重要军事情报并传递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同时与倪子明、方然、绿原等一同筹备创办了大型进步文艺期刊《呼吸》(1946年11月在成都创刊)。当然,在此期间阿垅也曾于《呼吸》第三期上发表的《略论“吵架”与“求爱”》中公开声援被何其芳以《关于实事求是》一文针对过的舒芜的《论“实事求是”》。1947年春,因情报工作暴露及不久后受到通缉,阿垅先后逃到重庆、南京。根据关根谦的推论,由于蒋介石在1948年突然宣布下野,副总统李宗仁成为代总统,而军部则由桂系军阀的白崇禧掌权,阿垅或许因此而获得重新潜入国民党内部的时机<sup>[16]</sup>。在逃亡期间,阿垅的状态实际上并不好,胡风在给阿垅的信中常常鼓励他要摆脱苦闷的情绪投入到创作中。但阿垅直到逃向杭州和南京安定之后,其诗歌理论产量和相关文艺活动才显著增加。1948年初,阿垅编成了政治诗集《写于悲愤的城》、爱情诗集《白色花》(未能出版),同时,阿垅写作了大量的诗歌和诗论,多发表于“七月派”同人编办的报刊上,如朱谷怀等在北平编辑的《泥土》,罗洛等在成都编辑的《荒鸡小集》,方典等在上海编辑的《横眉小辑》,欧阳庄、化铁等在南京编辑的《蚂蚁小集》以及《时代日报》等。而正是此一时期发表的《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于1947年8月21日写成)一文,才成为阿垅完全卷入文坛论争的重要节点。

1947年1月,曾在1944年被胡风的“七月派”朋友集中批评过的姚雪垠也回到了上海,不久便在“怀正文化社”出版的《雪垠创作集》的“序”和“后记”(“跋”)中对“七月派”以《希望》为阵地对他的批评进行了辩解和反击,并首次正面从“宗派主义”角度定义以胡风为核心的“七月派”文学群体<sup>[17]</sup>。姚雪垠的文章令文坛瞩目,使得胡风一方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回应与澄清——阿垅的《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一文便因此产生,并于1947年9月先后刊

登于楼适夷主持的《时代日报》“文化版”和《泥土》第四期。

阿垅的《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一文意在以“飞碟”之虚无印证姚雪垠所谓“宗派主义”之荒谬,自有其构思巧妙之优点,但或许急于应对姚雪垠的攻讦,阿垅的行文也充斥着意气用事的言辞和并无实证的判定。尤其是为了在政治立场上推倒姚雪垠,阿垅在文中凭空给姚雪垠扣上“法西斯棍徒”和“特务作家”的污名,并在毫无佐证的情况下编造姚雪垠在重庆时期于报纸上发表过悔罪自白(后文简称“重庆自白”)。阿垅的《从“飞碟”说到姚雪垠底歇斯的里》遭到姚雪垠的强烈抗议。姚雪垠很快写出《为阿垅一文致文化版编者信》刊登于1947年9月13日的《时代日报》“文化版”上,明确要求阿垅对其“重庆自白”之编造与政治污蔑给出切实的回复。此次论战最后虽然以阿垅的《致〈时代日报〉编者的公开信》尴尬收场,但阿垅行文不够严谨和意气用事的弱点已经暴露无遗,成为引发其悲剧命运的隐患。

## 五

如前所述,1948年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以《大众文艺丛刊》为阵地所展开的意识形态“询唤”,结果招致的却是胡风赶写出长文《现实主义的路》(1948年由青林社出版),以聚焦于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和现实主义美学问题的形式而进行辩论和反批评。这种对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热情与专注大大削弱了胡风本就不强的政治敏感度。而且,作为“七月派”同人的理论引领者,胡风的言行难免会大大影响他的朋友们。那些在文艺思想上与胡风相呼应的“七月派”同人,自然也是意识形态“询唤”者所要批评的对象。只是让人们意料之外的是,在“香港批判”中被忽视的阿垅会成为建国后被高层向胡风和他的支持者进行“思想斗争”的第一个“靶子”、一个意外的“突破口”。

作为“七月派”中已经有很大文学影响的著

名作家,阿垅在新中国诞生之前就成为出席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 753 位代表中的一员。1950 年 2 月,应“七月派”同人鲁藜和芦甸之邀,阿垅担任了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创作组组长和天津市文学工作者协会编辑部主任,并参与了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的编辑工作。而阿垅之所以离开工作时间不长的上海铁路局,选择了与他此前的地理活动轨迹毫不相干的天津,或许是因为有着和胡风相似的分析:“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北京太挤,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绪,是以香港遗风为指针的。东北没有这个压力(或很薄弱),且与天津接近。天津文坛很活泼,鲁藜等主持,很有前途。”<sup>[18]</sup>

不过,也许正是这一“活泼”的氛围,使阿垅畅所欲言。就在新中国的文坛主管为寻找解决胡风思想问题的路径而一筹莫展之际,获得安稳生活的阿垅却恰巧创作并发表了两篇探讨现实主义创作的文论《论倾向性》<sup>[19]</sup>和《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sup>[20](P182)</sup>。这两篇文章均延续了阿垅在 20 世纪 40 年代诗学思考的内核,同时又具有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积极表态的意味。可惜令阿垅始料未及的是,两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受到了周扬和《人民日报》的猛烈批评<sup>[21]</sup>。

《论倾向性》一文,原是阿垅基于毛泽东的《讲话》中对文艺作品政治标准与文艺标准的分析而展开论述的。阿垅在文中引用了毛泽东这样一段原话:“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sup>[22]</sup>阿垅借此强调了政治与艺术的一元论,进而对公式主义、教条主义、机械论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重点说明了文艺的政治功能只有在具备充分的艺术性的同时才能发挥到最大化。然而,1950 年 3 月 12 日

由《人民日报》发表的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评阿垅的〈论倾向性〉》一文,却对阿垅进行了严厉的质疑与指责,认为阿垅对毛泽东“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讲话精神作了“鲁莽的歪曲”,“用十分直率的态度宣布了自己的纯粹唯心论的观点,这就是‘艺术即政治’”,甚至认为阿垅这一文论“以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始,以反对艺术积极地为政治服务终”<sup>[23]</sup>。实际上,陈涌对阿垅《论倾向性》一文的理解与批评才是严重的“歪曲”。阿垅所强调的文学的艺术性,恰恰是以增强文学的政治功能为前提和旨归的,由此才能辩证地阐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当然,阿垅的行文中有过“艺术即政治”这一表示强调的语句,似有艺术大于政治之意,但据此判定阿垅以文艺消解政治,显然有断章取义的粗暴之嫌。纵观阿垅过去所作的文论、诗论,不难判断阿垅对于文艺政治性的强调反而是一以贯之、非常明确而坚定的。早在 1941 年 9 月的诗论《箭头指向:〔诗歌〕》中,阿垅就强调过诗人要拿起诗这个“政治的武器”<sup>[8]</sup>,1943 年更是以《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的短文,直白地反对“远离了政治的”诗歌现象<sup>[24]</sup>。可以看出,阿垅很早就开始思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承认过文艺的政治功能了;更何况,1950 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较之前的文论更显周全,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关头被陈涌故意“歪曲”呢?

诚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0 年 3 月 19 日的《人民日报》接着又刊登了史笃的《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一文,对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大加批评,并直接给阿垅贴上了一个“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的政治标签。而史笃立论的依据却只是阿垅在引文上的一点纰漏,即阿垅给胡风的信中所言:“我抄了《科学的艺术论》中的一段话,在我底笔记本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抄最后一节话,而关键却在这最后一节话。其次,这书译文又错了。”<sup>[25]</sup>对此,史笃不仅严厉指责阿垅“冒充”“污辱”“玷污”马列主义,而且武断地认为阿垅是故意隐

瞒,目的是“为了盗用马列主义词句”,“然后作出马克思把特务的著作推荐给我们作‘范例’和‘方向’的罪恶推论”。除此之外,史笃还批评阿垅:“说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无分彼此,同等重要,那就恰恰等于放弃了对正面人物的深入,也就恰恰违背了历史所交给文艺的主要任务:表现新中国的新的、人物。”<sup>[26]</sup>同时,认为其“把现实主义描写成一种可以离开世界观而独来独往的超时代超阶级的法宝”,“也就是取消了作为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灵魂的文艺的党性的原则”<sup>[26]</sup>。

实际上,但凡能够秉持实事求是及“知人论世”的原则,即可明了阿垅的文论、诗论不但不是反马列主义的,反而正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对文艺现实实践作出的辩证思考。《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一文主要探讨了两个问题:一是思考在为工农兵创作文艺时,是否应该描写其他阶级?二是如何写好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而阿垅作出的回答是:“无论写正面人物或者反面人物,我们底武器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和现实主义。如果我们真正能够透彻地理解和把握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真诚地学习社会和忠于现实,确切地掌握和运用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的话,那么,我们是应该而且一定能够写好一切的。”<sup>[20](P192)</sup>面对如此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史笃却仍然强横地判定:“并不是马克思而是这位盗用者在提倡深入私生活的描写,并不是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而是这位盗用者的‘理论’,要引导文艺创作走向那个违反马列主义的‘方向’!”<sup>[26]</sup>今天看来,陈涌和史笃的批评,均有借题发挥、故甚其词的意味,这终究还是因为其掌控有强大政治权力支持的时代话语权,目的却是以阿垅为突破口试图再次打开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局面。

事实上,由于胡风在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前后表现得过于怠惰,对官方安排的工作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此后又有意规避“文艺斗争”,投入具体的“文艺创作”

(持续写作长诗《时间开始了》、修改梅志的童话诗《小红帽脱险记》等),较为隐退且沉默,这就使得想要对其进行批评改造的官方文坛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理论把柄。而正在这个时候,被认为是“胡风派理论家”“胡风的左右手”的阿垅<sup>[11]</sup>,却连续发表了两篇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且有“引文”不全的“硬伤”,这无疑是给当时的文坛主管提供了一个乘虚而入、“隔山打牛”的机会。

## 六

面对接连不断的高层批评,一向不愿轻易低头的阿垅,在鲁黎的劝解和周扬的施压后很快写出了一封诚恳的检讨信。1950年3月26日,《人民日报》附编者按刊登了《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一文,文中阿垅写道:“十几年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第一、我受不到党的教育;第二、阵地是分散的,孤立的;第三、我没有好好受过教育,完全是自学的,这样,使我在许多地方不能够深入,而造成了这一次大的错误。错误在我,请多批评,给我帮助,真诚地!”<sup>[27]</sup>而为此文所附的“编者按”是:“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精神是很好的,值得欢迎的,并且相信,经过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在文艺思想上将最后达到一致。”<sup>[27]</sup>这明显对阿垅的检讨予以了认可,并有以儆效尤之意。

不过,阿垅是否真如这封检讨信中所言一般认为错全在己,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胡风对阿垅此次检讨的判断是“主要还是他自己太弱”,并且“难免引起可欺之感”<sup>[28](P370-371)</sup>,但正如明心所分析推断的,“如果一个人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没有畏缩,很难想象他会在政治高压面前‘装死躺下’”,可以说,“阿垅1950年的‘检讨’,实际上是一种自我牺牲的做法。当他发现对自己文章的批判,是指向与自己相关的一群人时,他能够去做的就是自我承担,将朋友们与自己分开,由‘自己一个人负这个责任’,这种选择,与他在战场上的军人气质应该是一致



的。”<sup>[29]</sup>然而,即使阿垅为了不殃及自己的师友,检讨了自己所犯的实际错误,可是,阿垅仍然没有料到,这一次仅仅被上层作为要求他进行系列检讨的一个起始——后来他赴京参加茶会时,周扬和马凡陀(袁水拍)还希望他进一步写点东西<sup>[30](P213)</sup>。

最初得知此事,“七月派”同人路翎建议阿垅可以“把批评对方包在对自己的批评里”,而后,另一位“七月派”同人谢韬则认为,“即令这样,对方也一定不会甘心收场,因为他们正是不想收场的”,所以“最好还是不谈,因为现在还不是能够把问题都摊在群众面前的时候”<sup>[30](P212)</sup>。对此,胡风虽然一边赞同谢韬的看法,另一边又认为如此会“使对方起可欺之感,使群众起悲观情绪”,因而建议:“写一篇是必要的,但作为退兵的一战,只就引用及相关的如生活问题提出解释和反驳,其余都保留。而且要使读者感到,不是不讨论,而是不愿意戴帽子。”<sup>[28](P282)</sup>于是乎,在更多听取了胡风的建议之后,阿垅在同年4月至5月间创作了两篇更为严谨的反批评文论——《关于〈论倾向性〉》和《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sup>⑤</sup>前文就“艺术即政治”这一命题的合理性进行了集中论证,后文就引用材料的问题、“深入私生活”问题作出进一步探讨。这与其说是检讨,不如说是针对批评者陈涌和史笃提出的问题而进行了自我辩护甚至反批评。不言而喻,在期待阿垅较上次“检讨”更具反省和悔罪意识的周扬一方看来,阿垅的这种自我辩护无异于“狡辩”,乃至是对此前“检讨”的推翻。

不出意外,1950年6月9日,周扬将阿垅寄给自己请求发表的两篇反批评稿件退回并复信,认为这次的文章“完全是替自己辩护,没有一点自我批评”,同时还指出其“尽管旁征博引了许多马列毛泽东著作中的字句,但却阉割了他们的革命的核心”,不单“理论是不正确的”,而且“态度也是不好的”<sup>[31]</sup>。对此,阿垅听取了胡风“无数遍地寄来就寄回去”的建议<sup>[28](P286)</sup>,

同年8月9日,阿垅将再次修改过的文稿第二次投寄《人民日报》,也仍未被发表。在这期间,阿垅开始感到环境气氛的变化:“连座谈会他也被禁止发言,还好像准备整风似的。写一点小文都弄得无发表处了。”<sup>[32]</sup>

现在看来,在此次“引文”公案中,阿垅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胡风与周扬等意识形态主管进行对话的中介,而在阿垅的反批评(或“反检讨”)中又无不有着胡风的介入。尤其是胡风所谓“退兵的一战”“无数遍地寄来就寄回去”的建议,无疑令尚存犹疑的阿垅有了一些自辩的底气,满足了阿垅本就想驳回无根据指责的意愿。最终,阿垅请求发文无果后,竟作出了较为极端的选择——于1950年9月26日向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写信。<sup>⑥</sup>

在给毛泽东的信中,阿垅起首便写道:“这是一个文艺思想问题,不但关系到目前所存在的巨大的现实要求,而且事情发展到今天,除了向您陈述情况和请求指示,已经无从解决这个问题。”而在全信快要结束时,阿垅又以“无事不可对党言”的赤诚这样说:“我只是涓滴归海似地,探索着马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问题,探索着行进而已”,“像周扬同志底报告,是一个负责同志在广大的群众和干部面前的发言,阿英同志底报告则是一个正式文件。这都必须向党,向群众,以及向批判对象负责。‘社会民主党’、‘伪造’、‘歪曲’、‘否定’和‘欺骗’等说法,如果没有根据,我以为,都是极不好,也不解决问题的”<sup>[33]</sup>。总的来看,在这封信中,阿垅不单严谨地叙述了自己两篇文章受批评的全过程,还诉说了自己继“自我批评”之后的文章多次投递无果的事实,也倾诉了在1950年9月15日的天津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阿英对他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并对自己所持有的观点进行了详细阐述和说明。这无异于是一封“求助信”抑或是“状告书”,阿垅此举可谓病急乱投医。这封信究竟有没有被毛泽东亲阅已不得而知,但可以明确的是,此信一经投出便如

石沉大海一般,并无回音。阿垅的问题由此开始似乎归于平静了。直到1954年,阿垅有四年的时间减少了文艺理论工作,而参与到具体的实践工作之中。

## 七

1954年2月18日,在中央先行解决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问题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公报《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其中提出开展党内正确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倡议。对此,胡风以为是一个从根本上反击周扬等文坛主管对自己和“七月派”同人的多年压制而解决新中国文艺领域“宗派主义”问题的好机会。于是,自1954年3月12日开始,他放下手中所有工作,在“七月派”同人路翎、谢韬、绿原、罗洛、张中晓、方然和阿垅等积极协助下,撰写《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简称“三十万言书”),直接“上书”中共中央决策层。1954年7月22日,胡风将“三十万言书”交予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转呈中央。这情形非常类似于阿垅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多有鸣冤叫屈、状告周扬等人搞“宗派主义”的内容。但是中央并未作出即时回应。1954年10月16日,毛主席却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问题的一封信》,亲自发动了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论和《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文艺界“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同年10月24日,毛泽东指定袁水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对此,胡风误以为自己的“上书”见效了。于是,一改之前的消沉,胡风在1954年10月31日开始的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中,毫不含蓄地以阿垅等人的遭遇为例,激烈批评《文艺报》和《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压制“小人物”的错误,同时还为阿垅辩解,提出要“把‘伪造马列主义’的帽子替阿垅同志松一松”<sup>[34]</sup>。就这样,阿垅的名字再次在官方会议上成为聚焦点。

也就在胡风为“小人物”阿垅辩驳的同时,在天津的阿垅同样对袁水拍进行了反击。1954年11月9日,阿垅写信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指责因袁水拍的领导作风、工作态度所导致的“党报在文艺方面所出现的不应有的荒凉的景象”,认为袁水拍压制不发《关于〈论倾向性〉》《关于〈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两文的“老爷”作风,并批评他的讽刺诗《马凡陀山歌》里面“存在着异常浓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sup>[35]</sup>。

然而,形势的发展变化再次证明,胡风、阿垅以为最高决策层会站在代表真理的自己一边的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1954年12月8日,周扬在会上以经过毛泽东审阅过的《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为题的发言中对胡风进行了彻底反击,也再次提及阿垅,并明确强调,“我现在仍认为,四年前我们对阿垅的批评即使还有缺点,在基本点上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sup>[36]</sup>

风云突变,胡风和他的支持者们最终还是迎来了他们无力抵抗的终审裁决,“三十万言书”在1954年底被中共中央转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处理,加之舒芜上交的与胡风的私人通信成了可以捕风捉影的“罪证”,一场基于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突然升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中宣部报告,胡风的文艺思想不仅没有去掉“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思想”的烙印,反而被升级为“反党反人民”的“罪行”。1955年5月,“胡风事件”爆发,阿垅及其诗论、文论也迅速成为文坛学界争相批判的热点,讨伐檄文纷纷涌现,如霍松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批判阿垅的反动的诗歌》,沙鸥在《文艺报》上发表的《阿垅的反动的诗歌理论》,鲍昌在《文艺月报》发表的《粉碎阿垅的反革命诗歌“理论”》等。这些批评对阿垅诗歌理论中强调“自我”和“情绪”等“主观世界”因素进行了反驳,直接给其诗歌和诗论扣上“宣传唯心主义”“污蔑并否定祖国

的诗歌”的大帽子。而阿垅曾经借之以为中共革命获取军事情报的“国民党军官身份”反而成为中央对阿垅与“胡风集团”进行定罪的“铁证”,阿垅也因此被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二号人物身陷囹圄,直至在“文革”中含冤离世。

## 八

重新翻阅阿垅在 1951 年底未能顺利发行的《诗与现实》(三个分册),<sup>⑦</sup>可以发现,阿垅作为坚定的左翼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认同文艺为政治服务,理论立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他曾以诗歌美学观念的不同,将诗人划分为“康德底美学理论派生而来的唯心论者”和“唯物辩证法的战斗者”<sup>[37]</sup>。在这一基础上,他认为,“诗底状态和方向是人民底觉醒状态和觉醒方向”,“人和诗被历史和社会所规定,人和诗也仅仅为了历史和社会”。但是,阿垅也强调诗人对自身主观能动性的调动的重要性,认为诗歌的创作应当“一面被‘物’所支配和决定,一面又抱紧了时代和生命打滚”<sup>[8]</sup>。这些与胡风文学理论中所提倡的“主观战斗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正如胡风与毛泽东的文艺理论在民族形式问题上产生的分歧一样,阿垅也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在 1938 年提倡的“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38]</sup>,亦没有领会毛泽东在 1942 年的《讲话》中对继承并超越五四启蒙的文学和政治诉求。<sup>⑧</sup>这一点具体表现为阿垅对这一时期重新复活的方言、山歌这一类诗歌形式所持有的怀疑态度。比如,阿垅在《“大众化”片论——关于诗底技巧论之三》中表示,“形式地大众化,绝不是真实的大众化”,“用口语、山歌之类来写的结果,虽然可以相当地扩大诗底读者群,但是这类诗,仍旧不是为大众所需要的,读着冷清,读过淡忘而已”<sup>[39]</sup>;再如《语言片论》中所写:“山歌这一形式是一种过去的形式,很不容易夺取那种有进步的要求的语言来构成它自己的。”<sup>[40]</sup>

诸如此类的论断不一而足。阿垅也据此对那些以“民间化”探索新文学民族形式的作家多有否定,难免有与延安流行的文艺实践观相悖的观点。可以说,阿垅的诗学观仍然延续着五四启蒙主义的思路,难以把握民族形式背后的“中国化”问题,更难以意识到口语、山歌、方言入诗的文艺民族化、民间化道路,在根本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进行现代性改造的迫切需求。而当阿垅和胡风执着于文艺理论问题的辩论时,显然忽略了自己所认同的文艺具有政治性的观念,并最终遭受了政治逻辑的致命打击。

从漫长的人类历史来看,任何个人的思想都有其局限性,阿垅与他的诗论也并不完美,只是他不幸生活在一个斗争严肃且转折剧烈的大时代,无辜成为了一个牺牲者。但历史无情也有情,胡风、阿垅等“七月派”同人终究还是得到了公正的结论,实现了阿垅生前唯一的热望:通过这次事件,能够得到党和同志们的谅解和信任,得到喜剧的收场。借用阿垅辩证的眼光来看,“胡风事件”,“这是一个错误。但相对于党的整个事业和功勋而论,这个错误所占的地位是很小的”<sup>[9]</su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垅诗案”给后人留下了远远大于文艺本身的启示与遗产。

## 〔注释〕

- ① 《大众文艺丛刊》(简称《丛刊》),“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同人刊物,而是当时左翼文学人士在香港创办的一个机关刊物,隶属‘文委’(即中共华南局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参见曾令存著:《学科视野中的 40—70 年代文学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43 页;钱理群曾谈到:“《丛刊》第 1 辑‘文艺的新方向’一出版,就在香港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坛产生震动”,“以致今日要了解与研究 1948 年的中国文学及以后的发展趋向,就一定得查阅这套《丛刊》”。参见钱理群:《1948 年: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3 页。
- ② 胡风在 1954 年写成的《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三十万言书”)中如是评价自己:“我,把阶级事业当作第一生命走过来的文艺工作者”,近年来感到“自己终于被一些同志正面地全面地当作了文艺发展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参见胡风:《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

报告》,《胡风全集》(第6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页。

- ③ 吴奚如(1906—1985),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1934年加入中共中央特别行动科工作,担任鲁迅和党中央联系的承转人,在1936年“两个口号论争”中支持过鲁迅、冯雪峰、胡风,西安事变后回到延安,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政治教员。在阿垅欲前往延安学习时,吴奚如当时正好在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任周恩来秘书。
- ④ 阿垅的弟弟陈守春回忆:“哥哥当时在胡宗南部队。胡宗南部队的任务是包围延安,哥哥白天担任部队包围圈的一个区域的守备军官,晚上去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据关根谦考证与推测,无论陈守春的回忆是否有偏差,阿垅的行动轨迹确实与胡宗南的部队有重合之处。并且,阿垅延安之行的“正式”申请中记载了“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这是1937年国共合作改编为“八路军”的国民革命军的共产党红军,由经过军制上的修改编制的新的军团的名称,其“办事处”设在西安。而事实上,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四军团所属陆军上尉陈守梅在胡宗南指挥下的军团的根据地也在西安,因此在国共合作政策下,向共产党领导下的第十八集团军代表部申请到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机会。参见关根谦:《抵抗の文学:国民革命军将领阿垅の文学と生涯》,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6年版,第67-68页。
- ⑤ 这两篇“反批评”文章在当时未能顺利发表,后收录于《后虬江路文辑》,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 ⑥ 阿垅于1950年9月2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用小楷誊写,长达十二页,共计六千余字,上有公安部的档案编号。2009年,阿垅之子陈沛将此信连同其他一些阿垅手稿捐赠给北京鲁迅博物馆,现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胡风文库。在北京鲁迅博物馆资料保管部工作的常楠以文论的形式将该信附在长文后公之于众,参见常楠:《阿垅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兼谈阿垅与“1950年理论批判”》,载《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5期。
- ⑦ 1951年底,阿垅的诗论集《诗与现实》(三个分册)交托于五十年代出版社社长金长佑,出版没多久就遭到封杀,不仅新华书店不批发,《人民日报》的广告也不予刊登。
- ⑧ 贺桂梅言:“以陈伯达、周扬、艾思奇、柯仲平、何其芳、光未然、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延安主流观点,凸显了五四新文艺的缺陷,同时也强调以五四新文艺为基础,吸收经过思想和艺术改造的传统旧形式,进而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与之构成冲突的,是胡风、冯雪峰等‘保卫五四派’。他们(特别是胡风在《论民族形式问题》一文中)坚持五四新文艺的‘现实主义’传统本身就是足够现代的,并且这一传统与‘封建性’的旧形式之间并不存在互相融合的可能

性,由此,也基本否定了在批判五四新文艺基础上创造更‘高’民族形式的必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构想的,可以说是一种‘党一国’的政治运作形态,即以政党(由毛泽东和‘革命政治家们’构成的先锋党)为能动的媒介,将‘群众’和‘国家’都转化为一种批判性政治社会的构成部分。”“人民这一政治主体固然有被改造的客体性成份(‘重要的是教育农民’),但不同于启蒙主义理念与政治的关键在于,因其被纳入阶级政治的能动实践整体中而具有了充分的主体性。这也是从‘国民性’话语到‘阶级’话语,从‘国民文学’到‘人民文艺’的关键转型。”参见贺桂梅《书写“中国气派”: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40页、41页。

### [参考文献]

- [1] 绿原,胡风和我[A]//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620.
- [2] 何其芳.何其芳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9.
- [3] 王丽丽.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48.
- [4] 楼适夷.记胡风[A]//晓风,主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人回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8.
- [5] 林默涵,黄华英.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林默涵问答录之一)[J].新文学史料,1989(3):4-28.
- [6] 阿垅.无题(又一篇)[A]//阿垅.无题[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21.
- [7] 万同林.殉道者——胡风及其同仁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395.
- [8] 阿垅.箭头指向:〔诗歌〕[J].希望,1945(1):6-15.
- [9] 阿垅.可以被压碎,决不被压服[J].新文学史料,2001(2):66-67.
- [10] 吴永平.阿垅“引文”公案的历史风貌——罗飞《为阿垅辩诬》一文读后[J].粤海风,2006(6):31-37.
- [11] 王增铎.还阿垅以真实面目[J].新文学史料,2001(2):68-75.
- [12] 黎辛.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J].新文学史料,2001(2):83-112.
- [13] 胡风.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J].新中华,1944(6):125-131.
- [14] 吴永平.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92.
- [15] 胡风.关于结算过去[J].抗战文艺,1946(6):9-10.
- [16] [日]关根谦.抵抗の文学:国民革命军将领阿垅の文学と生涯[M].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6:150.

- [17] 姚雪垠.论胡风的宗派主义:“牛全德与红萝卜”序[J].雪风,1947(3):13-16.
- [18] 胡风.1950年3月15日自上海[A]//胡风.胡风致舒芜书信全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146.
- [19] 阿垅.论倾向性[A]//阿垅.后虬江路文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159-181.
- [20] 阿垅.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A]//阿垅.后虬江路文辑[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
- [21] 路翎.1950年3月16日自北京[A]//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209.
- [2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69-870.
- [23] 陈涌.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评阿垅的“论倾向性”[N].人民日报,1950-03-12.
- [24] 阿垅.我们今天需要政治内容,不是技巧[J].希望,1946(4):352-353.
- [25] 阿垅.1950年3月19日自天津[A]//阿垅.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265.
- [26] 史笃.反对歪曲和伪造马列主义[N].人民日报,1950-03-19.
- [27] 阿垅.阿垅先生的自我批评[N].人民日报,1950-03-26.
- [28] 胡风.胡风全集(第9卷)书信[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29] 明心.阿垅的“检讨”是一种自我牺牲行为[A]//北京鲁迅博物馆,编.一支不该凋谢的白色花:阿垅百年纪念集[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0:46-47.
- [30] 路翎.1950年4月8日自北京[A]//路翎.致胡风书信全编[M].郑州:大象出版社,2004.
- [31] 阿垅.阿垅 1950年6月13日自天津[A]//阿垅.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4:282.
- [32] 阿垅.阿垅 1950年8月17日自天津[A]//阿垅.阿垅致胡风书信全编[M].北京:中华书局 2014:289-290.
- [33] 常楠.阿垅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兼谈阿垅与“1950年理论批判”[J].鲁迅研究月刊,2012(5):72-81.
- [34] 胡风.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的发言[A]//胡风.胡风全集(第6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449-450.
- [35]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122.
- [36]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1954年12月8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的发言[N].人民日报,1954-12-10.
- [37] 亦门.诗片论[A]//亦门.诗与现实(第2分册)[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3-4.
- [38]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A]//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 [39] 亦门.“大众化”片论——关于诗底技巧论之三[A]//亦门.诗与现实(第1分册)[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274.
- [40] 亦门.语言片论[A]//亦门.诗与现实(第1分册)[M].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151.